

##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影响因素：一个综述

吴 晗 杨 飞 程 瑶\*

---

**内容提要**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文在介绍劳动报酬份额理论的基础上，对国内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包括劳动报酬份额的度量 and 资本深化、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开放经济、市场经济制度和税收政策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最后根据文献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劳动报酬份额 影响因素 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

---

### 一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大幅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劳动报酬份额从 1995 年的 51% 下降到 2007 年的 40%，之后虽然上升到 2010 年的 45%，但总体而言下降幅度较大，因此这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Bai et al. (2006)，李扬和殷剑峰（2007）较早地分析了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认为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是中国高投资和高储蓄的原因之一。赵俊康（2006）、梁东黎（2007）较早地分析了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如技术进步路线、要素市场及市场垄断等。不过这段时期对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比较零散且缺乏清晰的框架。

---

\* 吴晗，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wuhan910209@163.com；杨飞，南京审计学院公共经济学院，电子邮箱：boston\_ian@126.com；程瑶，南京审计学院公共经济学院，电子邮箱：chengyao2001@126.com。作者感谢 2012 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测算方法构建、多重因素分解与刘易斯拐点逼近后的政策治理思路》（12YJC790017）和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影响机制及对策研究》（2014SJB211）对研究工作的资助。

2008年以后关于劳动报酬份额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多,且大量采用了近年来欧美关于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框架,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证和量化分析。这些文献对于认识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就国内外对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劳动报酬份额的度量及非法人企业劳动报酬份额的处理;其次是分析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因素:资本深化、偏向性技术进步、市场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开放经济和财政税收政策等(Bentolila & Saint-Paul, 2003; Acemoglu, 2002; 2003; Bertoli, 2007; 周明海等, 2010a; 郭庆旺、吕冰洋, 2011)。本文将在介绍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述评,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界对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历史;第三部分对劳动报酬份额度量方面的文献进行综述;第四部分对劳动报酬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综述;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二 劳动报酬份额研究的历史

古典经济学将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收入在土地、劳动和资本之间分配,并认为收入分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权力与阶级关系对收入分配起到重要作用。李嘉图认为工人的工资是不变的,利润为总收入减去工资,因此总产出越高,利润也就越多,这里隐含的假设是劳动供给是充足的,劳动需求由资本积累决定,资本积累决定经济增长,马克思也持类似的观点(Kaldor, 1961)。

随着边际革命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兴起,收入分配理论继续沿着古典经济学的思路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但却抽掉了权力和阶级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克拉克在《财富的分配》中系统阐述了边际生产力理论,他将社会总收入分为三部分: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利润(这里的利润是指企业家才能获得的收入),自由竞争将保证劳动者获得劳动所生产的部分,资本家获得资本所生产的部分,企业家也获得他应得的部分,这个应得部分由各生产要素的最后生产力决定,如工资等于最后一单位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用今天的经济学术语就表示为工资等于边际劳动产品(约翰·克拉克, 1981)。不过同新古典经济学此后一段时间轻视功能性收入分配不同,约翰·克拉克很重视收入分配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并表示如果劳动者并没有按照其边际贡献获得他们应得的报酬,就有可能引发革命(马丁·布朗芬布伦纳, 2009)。

鲍利研究了英国国民核算账户后发现,该国劳动报酬份额几十年来(1880-1913

年)大体保持不变,被称为鲍利定律。此后凯恩斯、卡尔多相继将这一特点作为经济的一个事实,成为卡尔多特征事实的一个重要内容,经验研究也表明这段时期劳动报酬份额大体保持不变。在理论方面,凯恩斯观察到英国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资本的加速积累严重依赖消费需求的缩减(Bertoli, 2007),因此在凯恩斯以后,储蓄率被认为主要由边际消费倾向而非资本分配份额决定(郭庆旺、吕冰洋, 2011)。索罗模型中,边际储蓄倾向被设定为常数,而在此后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消费取决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并且能够通过金融市场平滑其消费,因而功能性收入分配对消费及储蓄没有显著影响,也不影响经济增长,它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Bertoli, 2007)<sup>①</sup>。由于上述原因,基于要素收入分配的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逐渐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忘,个人收入分配(Size Distributions of Income)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重心,直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研究发现欧洲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并不是常数,而是有趋势的变化,1980年前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此后开始下降,同时内生增长理论也为研究功能性收入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功能性收入分配研究重新获得了重视(Bertoli, 2007)。

### 三 劳动报酬份额度量的综述

劳动报酬份额的计算通常来自收入法GDP(国内生产总值),收入法GDP包括劳动收入、生产税净额、资本折旧和营业盈余。劳动报酬份额为劳动收入与收入法GDP的比值,虽然公式简单,但分子和分母的度量有很多争议,比如生产税净额的处理,非法人企业收入的处理等。

#### (一) 生产税净额的处理

在劳动报酬份额的计算中,作为分母的GDP可以按市场价格法计算,也可以按要素成本法计算,要素成本法GDP为市场价格法GDP减去生产税净额。根据Batini et al. (2000),工人和企业的收入应该来源于企业的经济行为,但生产税净额支付给了政府而非企业,因此生产税净额应该从GDP中剔除,即以要素成本法计算劳动报酬份额。如果以要素成本法计算中国劳动报酬份额,1996年后劳动报酬份额开始下降(白重恩、

---

<sup>①</sup> 收入分配问题是后凯恩斯学派的核心之一,卡尔多认为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具有不同的储蓄倾向,后来帕西内蒂将这一假设进行修改,认为工人也能获得利息所得,因此储蓄倾向的差异源于阶级的差异,而非要素所得来源的差异,有差异的储蓄倾向意味着收入分配会影响经济社会的总储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及功能性收入分配。

钱震杰, 2009); 如果以市场价格法计算劳动报酬份额, 1998年后劳动报酬份额开始下降(张车伟、张士斌, 2010)。不过不论以哪种方法计算, 劳动报酬份额的总体变动趋势没有改变。

### (二) 非法人企业劳动报酬份额的处理

非法人企业的收入不能直观地划分为劳动所得或资本所得, 现有文献多采用表1中的方法对此进行估计(Morel, 2006)。对于中国非法人企业收入的划分, 2003年以前非法人企业的劳动报酬和营业利润全部归入劳动所得, 但2004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对核算方法进行了调整, 将非法人企业劳动报酬及经营利润全部划入营业利润, 而将农业营业盈余和劳动者报酬统一记为劳动者报酬, 导致2004年后劳动报酬份额大幅下降。为了与2004年之前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需要按2003年之前的方法对2004年以后的数据进行调整。在未作调整的情况下, 2003-2004年下降5.3个百分点, 经调整后劳动报酬份额实际上升1个百分点, 所以统计因素是2004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罗长远、张军, 2009a)。2009年国家统计局再一次对收入法GDP的统计核算方法进行调整, 使得劳动报酬份额突然上升到46.7%, 比2007年上升7个百分点, 但具体的调整方法未作说明。

表1 考虑非法人企业及农业部门劳动报酬份额调整方法

方法	公式	说明
方法1	$\frac{\text{忽略个体经济的劳动收入}}{\text{GDP}}$	该方法低估了劳动报酬份额, 适合于非法人企业比例低的行业, 如制造业。
方法2	$\frac{\text{劳动收入} + \text{非法人企业收入}}{\text{GDP}}$	该方法将非法人企业的全部收入归于劳动收入, 因而会高估劳动报酬份额, 适用于纯劳动服务行业。
方法3	$\frac{\text{劳动收入}}{\text{GDP} - \text{非法人企业收入}}$	该方法隐含的假设是非法人企业与法人企业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相同。
方法4	$\frac{\text{劳动收入}}{\text{受薪雇员}} \times \frac{\text{总雇佣人数}}{\text{GDP}}$	该方法假设受薪雇员与自我雇佣的平均工资相等。该方法虽然简单, 但可能导致行业水平上的劳动报酬份额大于1, 可能高估劳动报酬份额。
方法5	非法人企业收入的2/3归劳动, 1/3归资本。	

注: 劳动收入为法人企业的劳动收入, 不包含非法人企业和农业部门。如果采用要素成本法计算, 分母中的GDP改为(GDP-生产税净额)。

资料来源: Morel (2006)。

与中国统计核算体系采取的方法不同, 对非法人企业劳动报酬份额度量更为准确的方法是方法5。张车伟和张士斌(2010)按该方法调整后发现, 中国市场价格法劳动

报酬份额从 1978 年的 40.1% 上升到 1995 年 45.7%，此后下降到 2007 年的 39.2%，前后下降 1 个百分点，而未调整的劳动报酬份额从 1978 年的 49.6% 上升到 1995 年 51.4%，此后下降到 2007 年的 39.7%，下降 10 个百分点，变动幅度较大。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将农业劳动报酬份额（要素成本法）按生产函数法调整后，发现 1978 - 1994 年劳动报酬份额上升约 6 个百分点，1995 年 - 2004 年下降 2 个百分点，总体劳动报酬份额波动不大。为了避免统计方法差异引起的核算差异，张车伟（2012）测算了雇员劳动报酬份额，研究表明，雇员劳动报酬份额从 1992 年的 33.3% 下降到 2008 年的 30.3%，只下降 3 个百分点。

从上述关于劳动报酬份额度量的分析看，对非法人企业劳动报酬是否进行调整所得到的结果差异较大。罗长远和张军（2009a），肖文和周明海（2010b）仅对 2004 年的统计因素进行调整后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内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共同加剧了总体劳动报酬份额的波动，即总体劳动报酬份额的波动大于产业内劳动报酬份额的波动，产业间效应和产业内效应的共同作用并没有使劳动报酬份额处于稳定状态。但张车伟和张士斌（2011）利用调整后的数据对劳动报酬份额进行分解后表明，产业内劳动报酬份额的波动幅度大于总体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幅度，总体劳动报酬份额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只是同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偏低，是美国的 55%，日本的 68%，与新兴市场的劳动报酬份额相差 10%。可见，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要素市场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且农业和服务业存在诸多统计上的困难，对于劳动报酬份额是否稳定，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市场体系和统计核算体系的不断完善<sup>①</sup>。

## 四 劳动报酬份额影响因素的综述

### （一）资本深化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如果是科布 - 道格拉斯函数，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为 1，资本深化不会改变劳动报酬份额。如果是 CES（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

$$Y = (\delta(AK)^{\frac{\sigma-1}{\sigma}} + (1 - \delta)(BL)^{\frac{\sigma-1}{\sigma}})^{\frac{\sigma}{\sigma-1}} \quad (1)$$

$s_l$  为劳动报酬份额， $\delta$  为资本权重， $\sigma$  为替代弹性， $A$  为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 $B$

<sup>①</sup> 国内还有一些文献采用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等数据来源对劳动报酬份额进行测算。不论采用哪种方法，总的结论是中国劳动报酬份额近 10 年来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为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 $k$ 为资本产出比，则劳动报酬份额为：

$$s_l = 1 - \delta(Ak)^{\frac{\alpha-1}{\sigma}} \quad (2)$$

平衡增长路径下，资本与产出增长率相同，所以资本产出比不变，但在转型路径下，如果资本产出比 $k$ 增加，说明人均资本增长率大于人均产出增长率，这种情况也称为加速的资本深化（李文溥、李静，2011）。根据（2）式，当替代弹性大于1时，资本产出比增加会减少劳动报酬份额，替代弹性小于1时，资本产出比增加会提高劳动报酬份额，替代弹性为1时，资本产出比不影响劳动报酬份额<sup>①</sup>。目前多数文献研究表明，资本深化降低了劳动报酬份额。罗长远和张军（2009b），邵敏和黄玖立（2010）分析表明资本产出比提高降低了劳动报酬份额，说明替代弹性大于1。近20年来资本深化不仅降低了劳动报酬份额，而且劳动报酬份额的降低又提高了资本收益率，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资本深化，这也解释了中国资本收益率高的原因（罗知、赵奇伟，2013）。孙文杰（2012）利用投入产出表研究表明，1997年以前，中国需求结构主要由消费需求拉动，从而带动了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但1997年以后最终需求结构开始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由此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这也从需求角度证实了资本深化对劳动报酬份额的负向影响。不过，白重恩等（2008）表明，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报酬份额无显著影响，说明替代弹性等于1。

## （二）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根据（2）式，中性技术进步和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不会影响劳动报酬份额，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会影响劳动报酬份额，当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时，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使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当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时，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使劳动报酬份额上升，那么，何种条件下产生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或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取决于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价格效应是指商品价格越高，开发基于该商品的技术越有利可图，这意味着该技术倾向于利用稀缺要素，因为稀缺要素的价格高，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价格也高；市场规模效应是指要素越丰裕，开发利用该要素的技术将会有更大的市场规模，因而也是有利可图的，可见，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是相互排斥的，开发哪种技术需要权衡这两种效应，而哪种效应占主导地位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及要素禀赋变动状况，如当替代弹性大于1时，资本的相对供给（ $K/L$ ）增加将有利于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市场规模效应占主导），当替代弹性小于1时， $K/L$ 上升或工资上升

① 平衡增长路径下的劳动报酬份额为常数，见下文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劳动报酬份额影响的分析。

将促进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价格效应占主导）。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的边际产出，从而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但当替代弹性小于1时，其对资本的需求更多，即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增加了资本的相对需求，因此，当替代弹性小于1时，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也称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Acemoglu, 2002）。下文会多次用到此原理，也会交替使用增强型和偏向性技术进步。

希克斯和庇古研究表明，大部分技术进步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Rousseau, 2008），而且从长期来看，资本深化（ $K/L$ ）程度不断提高，如果这个过程中产生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则根据（2）式，劳动报酬份额会下降，但经验事实表明长期劳动报酬份额和资本产出比相对稳定，因此可以断定资本深化过程伴随着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且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即此时的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Acemoglu（2003）证明了这一点，只有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时存在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且此时只存在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而在转型路径上存在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因此，在长期内或平衡增长路径上，劳动报酬份额为常数，而在短期内劳动报酬份额会发生变动。

基于这一原理，国内的文献研究了资本深化过程中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刘小鲁（2012）通过测算1995-2006年产出对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弹性变化表明，这段期间技术进步呈资本偏向性，尤其是2001年以后，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加速上升，因此资本深化和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导致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黄先海和徐圣（2009）利用1989-2006年制造业数据，并以资本品价格指数作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指标实证分析表明，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部门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以时间趋势代表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发现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劳动报酬份额影响不显著。不过本文认为时间趋势作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的代理指标较资本品价格指数差。

### （三）市场经济制度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在不完全竞争经济中，工资和劳动边际产品间会插入一个“楔子”，影响这个“楔子”的因素包括市场扭曲、工会议价能力和劳动调整成本等（Bentolila & Saint-Paul, 2003）。

#### 1. 不完全经济市场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在有产品市场垄断的情况下，企业利润最大化意味着下式成立：

$$s_t = \frac{wL}{\mu pY} = \frac{1 - \delta(Ak)^{\frac{\sigma-1}{\sigma}}}{\mu} \quad (3)$$

$w$  为工资,  $p$  为产出价格, 劳动报酬份额与价格加成  $\mu$  呈负相关关系, 当资本产出比和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不变的时候, 随着垄断程度的提高, 价格加成也越高, 由于价格加成部分归于企业利润和薪酬 (salary), 因此价格加成的上升会降低劳动报酬份额。当要素市场存在扭曲时, 比如工资的相对价格被压低, 劳动报酬份额会降低, 此时的  $\mu$  可看做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中国产品市场垄断尤其是服务业市场的垄断程度较高, 白重恩等 (2008) 利用 1998 - 2005 年工业部门面板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 市场垄断、国企改制是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范围广, 资本价格低估和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情况也比较明显。宁光杰 (2013) 利用 2002 - 2004 年世界银行工业企业数据研究表明, 中国低利率政策促使企业利用资本代替劳动, 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魏下海等 (2013) 利用 2004、2006 和 2008 年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 政商关系密切的民营企业倾向于压低工资, 导致民营企业的劳动报酬份额下降, 尤其是那些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的地区, 这一效应更为明显。

## 2. 劳动议价能力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如图 1 所示, 横轴为劳动, 纵轴为劳动报酬份额, a 点为初始点, 如果议价能力提高导致工资上涨, 短期内, 资本 - 劳动比例和偏向性技术进步不发生变化, 工资上涨使劳动报酬份额上升至 b 点对应的劳动报酬份额水平。但长期内, 企业会通过调整资本 - 劳动比例和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应对工资上涨, 不过这样的调整取决于行业的资本 - 劳动替代弹性。当替代弹性小于 1 的时候, 资本 - 劳动比例调整比较困难, 但劳动稀缺或工资上涨导致的价格效应大于市场规模效应, 此时会发生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 进而减少对劳动的需求, 劳动报酬份额下降至 c 点对应的初始劳动报酬份额水平, 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 工会并不会改变劳动报酬份额水平 (Acemoglu, 2002; 2003)。当替代弹性大于 1 的时候, 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劳动 - 资本比例或采用资本增强型技术来应对工资上涨, 长期劳动报酬份额也降至初始水平。

Blanchard (1997) 分析了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大陆劳动报酬份额上升和 20 世纪 80 年代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大陆经历了有效工资上涨和劳动供给的逆向冲击, 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和劳动报酬份额上升, 不过为了应付这一负向冲击, 企业通过采用资本偏向性技术减少对劳动的需求, 导致 20 世纪 80 年代失业率上升, 劳动报酬份额下降。赵秋运等 (2012) 研究表明, 全球化使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上升, 因此全球化条件下工资刚性会促使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 这会导致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

祁毓和李祥云 (2011)、唐东波 (2011) 利用中国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 由于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的作用和吸引 FDI (外商直接投资) 的竞争, 地方政府



倾向于弱化工会职能和劳动保护，地方分权程度越高，劳动报酬份额下降越多。可以看出，欧洲的工会太强势促进了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而中国的工会在劳资谈判中缺位或者工资刚性导致资本替代劳动，这些都促进了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伍山林（2011）的理论研究表明，劳动报酬份额上升与否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目标结构、技术结构、税负结构和市场环境，工资要通过这些因素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影响，因此工资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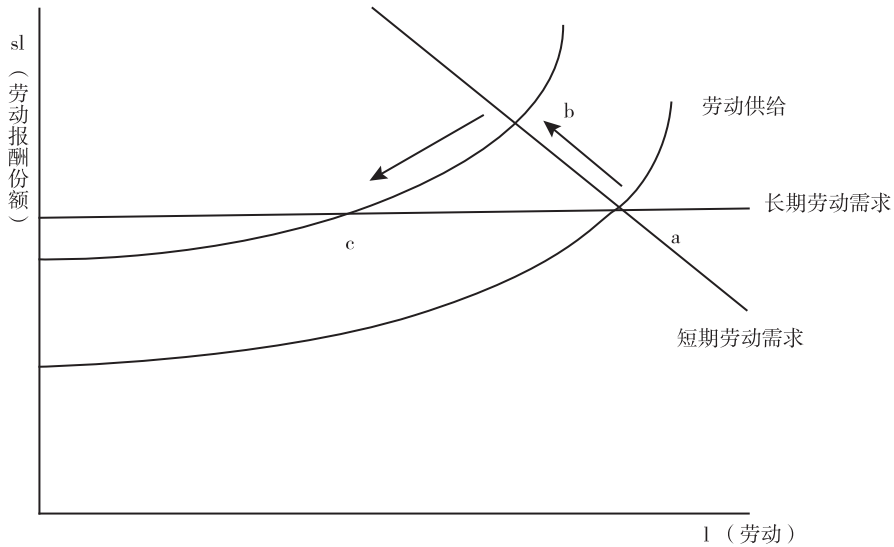


图1 劳动冲击下的劳动报酬份额

资料来源：Acemoglu (2002)。

#### (四) 结构变迁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考虑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时，可以利用(4)式对劳动报酬份额进行分解，给定每个产业劳动报酬份额不变，产业结构变化引起总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称为结构效应((5)式右边第一项)，给定产业结构不变，每个产业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导致总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称为产业效应((5)式右边第二项)。

$$s_t = \sum_{i=1}^n s_{it} w_{it} \tag{4}$$

$$s_t - s_{t-1} = \sum_{i=1}^n (w_{it} - w_{it-1}) s_{it-1} + \sum_{i=1}^n (s_{it} - s_{it-1}) w_{it} \tag{5}$$

$s_{it}$ 为*i*产业在*t*时期的劳动报酬份额， $w_{it}$ 为*i*产业在*t*时期占总增加值的比重。由于

产业结构本身也是经济运行的结果,因此考察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能够更好地了解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情况。影响产业结构变迁或非平衡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需求因素、资本深化、要素流动性、技术进步及开放经济等(Dennis et al., 2009),产业政策也会影响产业结构,而影响劳动报酬份额的因素包括资本深化、要素流动性、技术进步及开放经济等。可见,产业结构变迁和劳动报酬份额有很多相同的影响因素,但国内一些文献在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时,将产业结构也作为解释变量进入估计方程,这样做并不合适。因为产业结构本身不是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原因,而只是一种现象解释,最好用需求因素和政策因素替代产业结构作为解释变量,而用(5)式考察产业结构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则更加直观。

关于国内劳动报酬份额产业分解的相关文献已在上文做了介绍,如果对劳动报酬份额数据进行更精确的调整,结构效应是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主要来源,但变动幅度很小(张车伟、张士斌,2011)。另外,根据配第克拉克法则,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比重下降,工业比重上升,此后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因此劳动报酬份额将先下降后上升,不过英美服务业的发展事实和技能溢价理论表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过程中,劳动报酬份额不一定上升。这是因为新兴服务业是资本和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技能劳动与资本互补,与非技能劳动互替,随着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对技能劳动和资本的相对需求增加,对非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减少,因此劳动报酬份额会下降,可以推论只有当技能劳动占总劳动超过某一比例时,劳动报酬份额才会上升。王舒鸿(2012)利用中国1988-2011年数据研究表明,由于技能-资本的互补性,资本深化将会提高高技能劳动的需求,降低对低技能劳动的需求,进而导致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

#### (五) 开放经济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 1. 国际贸易与劳动报酬份额

国际贸易通过改变资源禀赋状况和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报酬份额。以外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表明,发达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本和技能劳动,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国际贸易会提高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进而提高发达国家的资本报酬份额和技能溢价(Guscina, 2006)。同时,国际贸易还会诱发偏向性技术进步,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会促进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和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进一步提高资本报酬份额和技能溢价,降低劳动报酬份额(Acemoglu, 2002)<sup>①</sup>。

<sup>①</sup> 如果资本、技能劳动对非技能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2,偏向性技术进步使资本和技能劳动的需求曲线斜率向上倾斜,这会进一步提高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能劳动存量(Acemoglu, 2002)。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低技能劳动比较丰富，因此生产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拥有比较优势，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国际贸易会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报酬份额（Guscina，2006）。但中国既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

首先看出口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有学者表明出口对劳动报酬份额影响为正（白重恩、钱震杰，2010；邵敏、黄玖立，2010），也有学者表明这种影响为负（张相伟、陆云航，2014）。陈晓华和范良聪（2011）、张相伟和陆云航（2014）进一步将产品分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其实证分析表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会提高劳动报酬份额，资本密集型出口会降低劳动报酬份额，因此出口增长降低劳动报酬份额的原因在于中国资本密集型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密集型出口。张莉等（2012）认为出口促进了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并提高了技能溢价，从而降低了劳动报酬份额。总的来看，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出口降低了劳动报酬份额。

再看进口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肖文和周明海（2010b）、张相伟和陆云航（2014）研究表明，进口渗透率对工业行业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为正，前者认为这和中国的进口加工贸易模式有关，这种加工贸易模式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后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进口国外资本密集型产品大幅上升，导致国内资本密集型产品收缩，从而提高了劳动报酬份额，资本密集型部门自然符合这一原理，而在劳动密集型部门，这种挤出效应较小，反而因为进口带来的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降低了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劳动报酬份额。

## 2. 资本流动与劳动报酬份额

新古典贸易理论假设劳动和资本不能跨国流动，如果资本能够跨国流动（如FDI），可以提高资本对劳动及政府政策的议价能力，这会降低劳动报酬份额（Rodrik，1997）。国内大多数学者通过计量分析表明FDI与劳动报酬份额负相关，主要原因在于FDI削弱了劳方议价能力（罗长远、张军，2009b）、以及中国FDI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提高了资本密集度（白重恩、钱震杰，2010；王舒鸿，2012）。

FDI通过技术外溢产生偏向性技术进步，当技术外溢偏向技能劳动时，产生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当技术外溢偏向非技能劳动力时，产生非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因此外资会通过偏向性技术进步影响技能劳动或非技能劳动的需求，进而影响技能溢价（邵敏、刘重力，2011）。根据上文关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介绍，当技能劳动占总劳动比例较低时，技能溢价提高会降低劳动报酬份额，技能溢价降低会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当技能劳动占总劳动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技能溢价提高会提高劳动报酬份

额,技能溢价降低会降低劳动报酬份额。邵敏和黄玖立(2010)通过1998-2003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工业行业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原因,认为外资企业的高工资使技能劳动流向外企,并产生了负向的“工资外溢”效应,从而提高了技能溢价,使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不过作者并未对这一推断进行证实,而Xu & Li(2008)证实中国绝大部分外企确实经历了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并提高了技能溢价,只有小部分外企经历了非技能劳动技术进步。

如果资本不能完全自由流动,资本管制将削弱资本的议价能力,因而资本管制会提高劳动报酬份额。此外,汇率也是影响资本流动的因素,货币升值会降低资本跨境配置成本,从而提高资本的议价能力并降低劳动报酬份额,不过货币升值还意味着本国非贸易品价格相对贸易品价格上升,导致劳动价格上升,从而劳动报酬份额上升,因此汇率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不确定。Harrison(2002)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二者为负相关关系(Harrison, 2002)。唐东波和王洁华(2011)利用中国1995-2007年数据研究表明,汇率升值显著降低了劳动报酬份额,该结论同Harrison(2002)一致。

#### (六) 税收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关于税收对劳动报酬份额影响的文献不是很多,郭庆旺和吕冰洋(2011)、Acemoglu(2003)就此得到不同的结论,前者表明税收会影响劳动报酬份额,后者在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后表明,税收政策从长期来看对劳动报酬份额没有影响。下面对此作一介绍。

郭庆旺和吕冰洋(2011)构建了一个包含税收的拉姆齐模型,生产函数为带有中性技术进步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者认为要素所有者所关注的是要素的最终回报,且直接税和间接税都会影响到要素的最终预期回报,所以税收会通过两种效应影响劳动报酬份额。一方面,税收会改变要素的相对投入比例,从而改变税前要素收益率,最终影响到劳动报酬份额(替代效应);另一方面,直接税会改变要素的税后收益率,从而影响到劳动报酬份额(收入效应)。作者得到的劳动报酬份额和资本报酬份额表达式为:

$$\begin{aligned} s_l &= (1 - \alpha)(1 - \tau_w)(1 - \tau_y\varphi) \\ s_k &= \alpha(1 - \tau_r)(1 - \tau_y\varphi) \end{aligned} \quad (6)$$

$\tau_w$ 、 $\tau_r$ 、 $\tau_y$ 分别为劳动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本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税(增值税或营业税), $\varphi$ 为产出征税范围。从(6)式可知,由于税收的影响,劳动报酬份额与资本报酬份额之和并不为1。作者的理论和经验分析表明,征收劳动所得税会降低劳动报酬份额,征收增值税会降低劳动报酬份额和资本报酬份额,

对二者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税负转嫁能力。由于中国实行价外税，税负主要转向劳动，因此增值税对劳动报酬份额的负向影响远大于资本。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也得到类似结论，该文基于1985-2003年数据表明，生产税净额占GDP比重每上升1%，劳动报酬份额下降0.8%，说明间接税的税负主要由劳动者承担。征收企业所得税会降低资本报酬份额和劳动报酬份额，李稻葵等（2009）利用2000-2004年微观企业数据表明，企业所得税占企业税前利润比重每上升1%，劳动报酬份额下降0.67%；营业税降低了资本报酬份额，而对劳动报酬份额影响不显著，这是由于中国的营业税按资本要素征税。总之，税收不会对要素报酬份额产生正的影响。

郭庆旺和吕冰洋（2011）的模型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要素替代弹性为1，且不能分析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因此该模型不能预测税收会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的长期影响，但根据Acemoglu（2003），虽然过去一百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税收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劳动报酬份额却相对稳定。中国从1978-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也大体稳定（张车伟、张士斌，2011），而仅包含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并不能为此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为此，Acemoglu（2003）采用了包含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和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的CES生产函数，该框架为税收政策下劳动报酬份额的长期稳定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下面对此作一简要介绍。

为分析方便且不失一般性，本文将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 $\beta$ 设为0.5，则Acemoglu（2003）的生产函数就是本文的（1）式，以资本收入税为例。在平衡增长路径下，欧拉方程为 $\dot{c}/c = ((1 - \tau_r)r - \rho)/\theta$ <sup>①</sup>，消费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 $g$ ，税前利率 $r$ 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出，则有：

$$r = \frac{1}{2}(1 - \delta)B[\delta k_e^{-(\varepsilon-1)/\varepsilon} + (1 - \delta)]^{1/(\varepsilon-1)} = \frac{\rho + \theta g}{1 - \tau_r} \quad (7)$$

$\varepsilon$ 为资本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替代弹性<sup>②</sup>， $k_e = BK/AL$ 为有效资本-劳动比。如果短期内不存在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则 $B$ 为常数。根据（7）式，征收资本所得税会提高利率，从而降低有效资本-劳动比，如果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则会降低劳动报酬份额，增加资本报酬份额。但在长期内，当替代弹性小于1时，提高了的利率

① 效用函数为不变相对风险厌恶函数（CRRA）， $c$ 为消费， $\rho$ 为贴现率， $\theta$ 为不变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② 要素替代弹性与 $\varepsilon$ 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varepsilon$ 大于或小于1时，要素替代弹性也大于或小于1，但 $\varepsilon$ 大于1时不存在平衡增长路径。为方便分析，这里只讨论 $\varepsilon$ 小于1的情况（Acemoglu，2003）。

会产生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 ( $B$  上升)。(2) 式表明这会提高劳动报酬份额,从而抵消了此前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最终使劳动报酬份额保持不变,同时  $B$  的上升使有效资本-劳动比重新回到初始水平。

### (七) 制度因素对劳动报酬份额影响

#### 1. 国有企业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本节的制度是指中国特有的制度,如国有企业、二元经济制度及由制度决定的要素流动性等。国内现有文献关于国有企业对劳动报酬份额影响的研究都是经验研究,且结论不一。李稻葵等(2009)利用中国微观数据,邵敏和黄玖立(2010)利用省级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均表明,由于国有企业更多地代表了资本密集型行业,国企比重上升会降低劳动报酬份额。白重恩等(2008)、罗长远和张军(2009b)、周明海等(2010b)的研究也表明,随着国企比重的下降,劳动报酬份额会下降。一方面,国企改革导致大量劳动力进入市场,提高了资方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国企改革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率,且高于工资涨幅,从而劳动报酬份额下降。

#### 2. 二元经济制度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二元经济背景下,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会通过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影响劳动报酬份额。龚刚和杨光(2010)构建了一个非均衡动态模型,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工资增长率小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使得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剩余劳动力消失,工资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决定,工资会逐渐上升,当工资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以后,劳动报酬份额开始上升。张松林等(2014)建立新兴古典经济模型,分析了市场化进程中二元经济转换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但农村劳动力过剩和户籍制度提高了企业对劳动力的谈判能力,压低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并使农村劳动力更多地成为兼业工人,而非全职工人,从而降低了劳动报酬份额。因此,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将提高劳动力对企业的谈判能力,进而可以抵消市场化对劳动报酬份额的负向影响。杨瑞龙和张泽华(2014)研究了刘易斯拐点前后劳动供给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刘易斯拐点到来前,劳动无限供给,企业可以最低工资雇佣劳动,因而劳动报酬份额较低,但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保留收益的提高将会促进劳动报酬份额上升。最后,该文采用中国199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该结论。

谢攀和李静(2010)利用1994-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周期与二元劳动力市场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发现劳动报酬份额呈弱顺周期特征。其理论解释如

下，在经济衰退期，政府主要投资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吸纳就业能力较弱，从而使劳动报酬份额进一步降低；同时，近年来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大幅度提升，而资本价格相对低廉，国有企业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资本，导致吸纳就业能力不足，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由于中国存在二元劳动力市场，在经济衰退期，农民工大量返乡，从而使衰退期的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更多。

### 3. 特定制度背景下的要素流动性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罗长远（2011）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改革和要素特定模型为背景，从要素流动性角度分析了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原因。改革开放初期，轻工业部门拥有比较优势，资本从重工业流向轻工业，而劳动缺乏流动性，根据要素特定模型，重工业部门产出和劳动报酬份额下降，而轻工业部门产出和劳动报酬份额上升，因而整个工业部门的劳动报酬份额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密集型新兴工业的比较优势显现，而且劳动力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流动性大为提升，但是由于新兴行业的国有企业受保护，阻碍了私人资本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向新兴行业的流入，资本流动性下降。根据要素特定模型，传统行业产出下降，新兴行业产出上升，但新兴行业的劳动报酬份额也下降，从而整个工业部门劳动报酬份额下降。

## 五 政策建议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介绍了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并综述了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关于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关于劳动报酬份额的度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总结如下：资本深化、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出口、FDI、市场垄断、要素市场扭曲和劳动所得税降低了劳动报酬份额。资本深化和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市场行为，我们不能控制。但贸易结构、市场垄断、要素市场扭曲和税收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当技能劳动比例较低时，出口不利于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因此加强技能劳动培训，提高技能劳动在总劳动中的比例，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同时也可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能含量和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第二，引导FDI向服务业转移，取消地方政府对FDI的超国民待遇。FDI向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转移，可以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取消FDI的超国民待遇可以提高劳动的议价能力，也可以创造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提高劳动报

酬份额。

第三，改革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改革户籍和社会劳动保障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和干预，例如，改革土地管理制度、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

第四，改革财税体制。规范政府预算外收入，减少财政的建设职能，提高财政的服务职能，这些措施可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将更多的国民收入归于企业和个人。

第五，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融合需要大量的高技能劳动，虽然暂时会降低劳动报酬份额，当高技能劳动占总劳动的大部分比例时有利于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这也是经济发展必经的阶段。

目前的已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目前关于劳动报酬份额的度量方法比较简单，再加上数据可得性问题，不同文献对于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趋势结论不一。这不仅需要统计核算体系的完善，也需要采取多种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耐心细致的研究。其次，现有文献大都为实证研究，进一步的研究需要结合中国实际构建理论模型，理解劳动报酬份额及其影响因素的微观作用机制。再次，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前研究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文献较多，但研究劳动报酬份额偏低的文献较少。最后，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对劳动力市场、偏向性技术进步、企业竞争力乃至整个宏观经济都会产生影响，但目前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较少，需要进一步探讨。

## 参考文献：

- 白重恩、钱震杰（2009），《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世界经济》第3期，第27-41页。
- 白重恩、钱震杰（2010），《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第12期，第30-27页。
- 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2008），《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经济研究》第8期，第16-28页。
- 陈晓华、范良聪（2011），《要素密集度偏向型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收入分配效应》，《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第102-115页。



- 龚刚、杨光（2010），《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第1-16页。
- 郭庆旺、吕冰洋（2011），《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经济研究》第6期，第16-30页。
- 黄先海、徐圣（2009），《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视角》，《经济研究》第7期，第34-44页。
-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2009），《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第1期，第70-82页。
- 李文溥、李静（2011），《要素比价扭曲、过度资本深化与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学术月刊》第2期，第68-77页。
- 李扬、殷剑峰（2007），《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经济研究》第6期，第14-26页。
- 梁东黎（2007），《转轨时期我国若干部门劳动报酬变化趋势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第4期，第40-47页。
- 刘小鲁（2012），《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与劳动要素价格变化率分解》，载于杨瑞龙主编《工资形成机制变革下的经济结构调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罗长远（2011），《比较优势、要素流动性与劳动收入占比：对工业部门的一个数值模拟》，《世界经济文汇》第5期，第35-49页。
- 罗长远、张军（2009a），《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第65-79页。
- 罗长远、张军（2009b），《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管理世界》第5期，第25-35页。
- 罗知、赵奇伟（2013），《为什么中国高投资与低劳动收入占比并存？——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增速差距的视角》，《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第1-13页。
- 马丁·布朗芬布伦纳（2009），《收入分配原理》，北京：华夏出版社。
- 宁光杰（2013），《市场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当代经济科学》第2期，第61-70页。
- 祁毓、李祥云（2011），《财政分权、劳动保护与劳动收入占比》，《南方经济》第11期，第42-53页。
- 邵敏、刘重力（2011），《外资进入与技能溢价——兼论我国FDI技术外溢的偏向性》，《世界经济研究》第1期，第67-74页。

- 邵敏、黄玖立 (2010), 《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经济学(季刊)》第4期, 第1189-1210页。
- 孙文杰 (2012),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基于最终需求和技术效率的视角》, 《经济研究》第6期, 第120-131页。
- 唐东波 (2011), 《全球化与劳动收入占比: 基于劳资议价能力的分析》, 《管理世界》第8期, 第23-33页。
- 唐东波、王洁华 (2011), 《贸易扩张、危机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研究》, 《金融研究》第9期, 第14-26页。
- 王舒鸿 (2012), 《FDI、劳动异质性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财经研究》第4期, 第59-68页。
- 魏下海、董志强、刘愿 (2013),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第5期, 第35-46页。
- 伍山林 (2011), 《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制: 一个微观模型》, 《经济研究》第9期, 第55-68页。
- 肖文、周明海 (2010a),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构因素——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的比较分析》, 《当代经济科学》第5期, 第69-76页。
- 肖文、周明海 (2010b), 《贸易模式转变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中国工业分行业的实证研究》, 《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第154-163页。
- 谢攀、李静 (2010), 《劳动报酬、经济周期与二元劳动力市场——基于周期性反应函数的估计》,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9期, 第107-117页。
- 杨瑞龙、张泽华 (2014), 《刘易斯“拐点”我国初次分配格局——劳动力供给曲线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经济问题》第11期, 第1-10页。
- 约翰·克拉克 (1981), 《财富的分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张车伟 (2012),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与总体工资水平估算及分析》, 《经济学动态》第9期, 第10-19页。
- 张车伟、张士斌 (2010), 《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与问题——以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为视角》, 《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第24-35页。
- 张车伟、张士斌 (2011), 《关于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变动的研究》, 《劳动经济评论》第1期, 第7-39页。
- 张莉、李捷瑜、徐现祥 (2012), 《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分配》, 《经济学(季刊)》第2期, 第409-428页。

- 张松林、孙文远、程瑶 (2014), 《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演变——兼论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成因》, 《经济评论》第3期, 第26-39页。
- 张相伟、陆云航 (2014), 《商品贸易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期, 第59-75页。
- 赵俊康 (2006), 《我国劳资分配比例分析》, 《统计研究》第12期, 第7-12页。
- 赵秋运、魏下海、张建武 (2012), 《国际贸易、工资刚性和劳动收入份额》, 《南开经济研究》第4期, 第37-52页。
- 周明海、肖文、姚先国 (2010a),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度量与解释的研究进展》, 《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 第92-105页。
- 周明海、肖文、姚先国 (2010b), 《企业异质性——所有制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 《管理世界》第10期, 第24-33页。
- Acemoglu, Daron (2002).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9 (4), 1055-1089.
- Acemoglu, Daron (2003). Labor and Capital 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1), 1-37.
- Bai, Chong-En, Chang-Tai Hsieh & Yingyi Qian (2006). 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2755.
- Batini, Jackson & S. Nickell (2000). Inflation Dynamics and the Labour Share in the UK. *External MPC Unit Discussion Paper*, No. 2.
- Bentolila, Samuel & Gilles Saint-Paul (2003). Explaining Movements in the Labor Share. *Contributions to Macroeconomics*, 3(1), 1-33.
- Bertoli, Farina (2007). The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Theory and Evidence. *DEPFID Working Papers*.
- Blanchard, Olivier (1997). The Medium Ru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 2.
- Dennis, Benjamin & Iscan Talan (2009). Engel versus Baumol: Accounting for Structural Change using Two Centuries of U. S. Dat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 186-202.
- Guscina, Anastasia (2006).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Labor's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 *IMF Working Paper*, WP/06/294.
- Harrison, E. (2002). Has Globalization Eroded Labor's Share? Some Cross-Country Evidence. U. C. Berkeley and NBER, Mimeo.
- Kaldor, Nicholas (1961). *The Theory of Capital*. London: McGraw-Hill.

- Morel, Louis(2006). A Sectoral Analysis of Labour's Share of Income in Canada. Research Department, Bank of Canada.
- Rodrik, Dani(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Rousseau, Peter(2008). Biased and Un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Steven Durlauf and Lawrence Blume( ed. ),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Palgrave Macmillan.
- Xu, Bin & Wei Li(2008). Trade Technology and China's Rising Skill Demand.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6(1), 59 – 84.

## **A Review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n the Decline of Labor Income Share in China**

Wu Han<sup>1</sup>, Yang Fei<sup>2</sup> & Cheng Yao<sup>2</sup>

(School of Economics, Naikai University<sup>1</sup>;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sup>2</sup>)

**Abstract:** Scholars have achieved fruitful progress about labor income share theory. This paper introduces labor income share theory and reviews the related researches about the decline of labor income share in china, including the measurements of labor income share, the determinants of labor income share, and the impacts of capital deepening, capita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open economy, market institution and tax policy on labor income share.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policy suggestions and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Keywords:** labor income share, impacting factor, capita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JEL Classification:** D33, E25, J30

(责任编辑: 周晓光)